



| 政党政治与中国问题书系 |

王长江 主编

社会动员论

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蔡志强 / 著



社会动员论

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蔡志强 /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动员论：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蔡志强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1

ISBN 978-7-214-14877-3

I. ①社… II. ①蔡… III. ①政治动员—研究—中国
IV. ①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8147 号

书 名 社会动员论：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著 者 蔡志强

责任编辑 唐爱萍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652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插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4877-3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王长江

关于政党政治，1985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政党辞典》赫然解释为：“指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之间的斗争”。以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定义，会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但在30年前，这似乎更是一个基本共识。翻翻同一年代的书籍，几乎众口一词。在那个年代，我们总把“政党政治”与西方多党制联系起来，似乎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历史上的这种状态，是有其原因的。客观环境方面不论，就自身状况而言，大概和我们这类基本上按苏共摹本建立起来的政党的特殊性有关。政党源自西方，随着代议制民主和议会政治的成形而成形、发展。苏共模式的党则与西方原生态的政党迥然不同。它们既非产生于既有体制内部，在这一点上只与社会民主党类似；也不是要沿着体制内的合法途径获得政权，这一点和社会民主党也没有了共同性。共产党的政权，乃是用领导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毛泽东语）的政治革命的手段取得。这种“革命党”的特

质，决定了它们在理念、理论、行为方式、体制机制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革命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有其无可置疑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显而易见，在革命党状态下，党和政权之间是一种对抗、离心的关系，需要特别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以示与旧制度、与体制内政党的决裂，才能动员起推翻现存制度的足够力量。在这种现实面前，类似政党活动共同规律这样的话题，绝对是不合时宜的。

但是，执政后的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在执政条件下，党和国家政权之间是一种向心的关系。无论是在什么性质的国家，无论属于什么性质的政党，需要思考的问题，都变成了如何处理好和政权的关系，如何科学地控制公权力、运用公权力，获得更多人群的支持和认同。我们可以说，由于各种政党性质不同、能力不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深有浅，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有殊有同，但不能说，有的政党需要思考这些问题，而有的政党不需要思考这些问题。不管人们的好恶，政党活动，特别是政党的执政活动有了越来越多的共性课题，研究这些共性问题，探索政党活动的普遍规律，成为所有政党都要面对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种类型的党来说，顺应时代要求，转变观念，就成为特别重要的事情。如果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缺乏认识，继续停留在革命党状态，沉溺于自己的特殊性，往往容易使我们陷入一种夸大特殊性、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的思维，不屑也不善于吸收借鉴他人的经验。这不但妨碍我们深化对规律的认识，而且会使我们变得思想狭隘、僵化，结果往往是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仍然要犯；别人付出的代价，我们仍然在付出；别人吃过的亏，我们照吃不误。

如果说，在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和搞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走的毕竟是一条特殊的道路，和处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其他国家缺乏共同性，因而强调特殊性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状况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它使我们重新关注政党政治，而且不

再是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来关注。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待政党政治，我们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和理念。什么是政党政治？在我看来，所谓政党政治，即政党作为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政治运行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党介入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政党政治最显著的特点。反过来说，只要政党在政治中具备这样的定位和功能，就都可以叫做政党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所当然地列在其中。

政党和民主政治相连。究其根底，政党不过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工具。其活动都围绕民主而展开：或者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或者把民主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我国属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党建立之时，虽然我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也正因为此，当我们党高高举起科学、民主的旗帜时，才获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政党围绕民主而运行，因推进民主而发展，这是政党政治不可更移的规律，也是政党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离开了这一点，便离开了基本航道，离开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二

作为把民众与公权力连接在一起的工具，政党政治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一方面，政党的首要目标（对相当一部分政党来说其实就是唯一目标）是控制公权力，政党活动因此而成为政治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政党是一种社会组织，表达和组织民意是政党的基本职责，因而又和社会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这个角度看，政党政治横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之间，是名符其实的跨学科研究。具体说来，政党政治的研究包含了以下基本范畴：政党与民众，政党与政权，以及既作为组织体又作为组合体的政党。

政党与民众。把所代表的民意输送到公权力的运行中去，是政党活动的起点。但是，正因为政党和民众是一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委托关系，引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需要研究。例如，政党不可能代表

全体民众。那么，它要代表多大比例的民众，才既有控制公权力的资格，又能有效地整合民意？在现实中，政党政治确实经常遇到这一矛盾。代表面过广，往往会在主张上显得庞杂、矛盾、不严谨而失去吸引力。代表性明确，却往往又因过于排他而大大缩小自己的支持面。这一矛盾，至今仍然是每个政党都要面对的一大困扰。又如，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或许是无可替代的，但作为工具，却正在遭遇其他工具（新兴媒体、民间组织等）的竞争。事实证明，政党不可能靠排挤它们为自己赢得空间，更不能利用政府的强力来压制它们的发展，而是不得不学会和它们和平相处、良性互动。对任何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政党与政权。在执政状态下，政党控制政权，这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无需研究的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公权力由于其自身特性，对政党既有强大的吸引力，也有强大的腐蚀力。这使得政党一方面要控制政权，另一方面又要和公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事实表明，若执政党和公权力毫无距离，固然能使公权力的运行全面体现执政党的意志，但是，公权力的腐蚀也会同时使政党变形，甚至使政党沉溺于权力，逐渐丧失政党作为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工具的作用。和公权力距离过远，当然会导致政党无法驾驭公权力，但距离过近，则会使得权力失控。总之，政党与公权力的距离和公权力运行的有效性之间，绝非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政党。这里的政党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组织体的政党。每一个具体的政党，都是一个组织。作为组织，要有能够吸引成员的意识形态，要有能够发挥整体力量的组织状态，要有能够担当起职责的人才。这些本身便是值得研究的内容。事实上，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都是和它们要达到的目标相协调的，并随之变化而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组织变革和改革的过程。当然，防止政党在变革过程中解体，同样是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二是作为组合体的政党。在这里，“政党”只是一个被抽象出来的概念，作为“民

众—政党—政权”分析框架中的“政党”，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中指的实际上都不是某一个具体政党，而是多个政党。这些政党构成政党体制，共同发挥连接民众与政权的作用。既然如此，什么样的政党体制能够最有效地履行政党的功能？在一些非政党（如社会组织、传媒等）开始明显地挤占政党一部分功能的情况下，政党政治如何运行？这些都是政党政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几对关系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政党政治研究的复杂图景。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看，问题更加复杂。事实上，这些关系从来都是纠缠在一起的。例如，政党不能只是准确地代表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因为，虽然这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可以非常明确，政党为之所做的奋斗也可以不遗余力，但如果这种诉求占量过小，政党就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掌握公权力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微乎其微。这里体现的是政党、民众、政权三者之间的复杂函数关系。又如，严密的组织形式可以使政党整体的力量得到充分体现。但是，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等级体系也往往容易使组织自身出现严重的官僚化，使被代表者诉求的输送变得艰难。这里体现的是组织结构、组织目标和民众诉求三者之间的关系。再如，获得了执政权的政党显然在赢得多数民众的支持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并不一定保证它始终如一地反映民意。相反，在缺乏公权力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公权力的腐蚀可能会使原本有着强大民意基础的执政党逐渐背离初衷，把公权力变成了营私的工具。这里体现的又是政党、公权力特性和民意的三者互动。

考察中国问题，同样离不开这些范畴。恰恰相反，因为过去研究不够，这些都应当成为我们深化研究的着力点。在我们看来，弄清中国政党政治，把握其未来走向，既要研究中国党自己的情况，也要下大力气研究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情况，更要在两者的比较中探寻政党活动规律性的东西。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系正像它的名称“政党政治与中国问题”所表达的那样，围绕这些方面而展开。

三

政党政治是一项现实性极强的研究。即使我们突出强调它的学术性，依然不能不带有直接的现实关照。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努力把理论性、学术性与正在进行的实践结合起来，更多地反映现实的要求。在我国，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这种关照十分必要。在研究中我们力求坚持以下原则，以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体现理论和现实的有机结合。

第一，开放性。既然政党政治要探索的是共性、规律性的东西，就必须面向世界，努力摆脱过去的局限。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在走出了最初的盲目照搬阶段，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锤炼中获得了足够的自信之后，我们同时也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甚至一度把美国也列为学习的榜样。毛泽东关于“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那样的事情，在英美国家不可能发生”的著名的论断，就是在那时作出的。遗憾的是，后来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冷战兴起，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随之我们的思想、思维方式也逐步走向封闭、教条、僵化。过多的东西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且事实上，苏联模式排他性地成了我们唯一效法的模式。后来，我们和苏联也决裂了。从此，借鉴、学习几乎成了一个敏感的禁区，各种类型的国家和政党再无一国一党能吸引我们的兴趣，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种完全封闭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得到承认，我们开始放开眼界，先从肯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和经验开始，进而对其他类型政党的看法也越来越客观，最后形成了“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共同成果”的认识。这是一种很高的认识境界。但在实践中，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仍然对我们有强大的影响，真正做到这一点尚有距离。

在开放性上，始终要处理好的一个关系是，既大胆吸收借鉴，

又不盲目照搬。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开放不等于照搬。由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生存环境决定，任何照搬都不可能成功。非但性质不同的国家、政党之间无法照搬，即使性质相同、文化相近，照搬也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又不能因为怕照搬而不加区别地把外国他党的经验排除在外。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们的实践中，后一种错误发生的次数更多一些。

第二，包容性。包容是一种心态，是开放的前提。我们研究的课题，来自现实。现实中存在的现象，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对事实简单地回答是与否，无助于我们得出正确的认识。相反，理性地看待政党政治中的各种现象，研究其中的道理和规律性，从中获得启迪，才是我们的目的。这就需要有包容之心，有海纳百川的肚量。唯此，我们才会有更高的视野。我们以往的一个误区是，对纷繁复杂的政党一概以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正确与谬误分类，凡属后者，必先否定之，尔后再找依据。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党思维。革命党思维有助于各社会阶层在阶级对决中进行意识形态“站队”，但对执政而言，这种“站队”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包容不是对特殊性的忽视，更不是否定特殊性。相反，在深刻认识彼此特殊性的条件下，才有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包容恰恰是对丰富性、多样性的接纳。因此可以说，没有包容的心态，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开放，还会从好不容易得来的开放重新回到封闭状态。一个成熟的民族，往往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显示包容性的民族。邓小平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在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我看来，这里的“左”不是那种原本意义上激进的“左”，恰恰指的是那种排斥一切、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那种态度。它是近几十年来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三，前沿性。当今世界千变万化，是一个已经被人们用“信息社会”命名的时代。借助新型媒介的力量，巨量信息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递，形成信息爆炸，使人们目不暇接。一种创新，今天看上

去非常新颖、非常时髦，明天或许就会变得陈旧。政党政治亦如此。我们看到，政党政治发展到今天不过二百多年，但发生的巨大变化却是政党产生之初所想象不到的。政党不但遍及全球，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二十个国家不实行政党政治，而且类型更加多样，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即使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传统政党，也在适应新的变化，调整自己。继续用过去的眼光来看这些政党，不但难以获得正确认识，还可能得出贻笑大方的结论。显然，我们的研究要把握住当今时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就必须紧跟时代潮流，追踪政党活动的最新动态，了解政党政治研究的最新成果，努力体现对政党政治的最新思考。

讲求前沿性，不等于一味地求新求奇，被一些政党表面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所谓创新所迷惑。这种情况，这些年来并不少见。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表现自己、炒作自己的平台，政党同样难以免俗。因此，在研究和探索中拨开表象，拂去喧嚣，抓住本质，是我们始终强调的，也是我们坚持的基本方向。

以上的话，是我对这套书系意图和思路的理解，希望能够在本书系中得到较好体现，得到读者的肯定和认同。如果读者在阅读之后能够有所收获，还能对内容提出进一步改进的意见，我们将不胜荣幸和感激。

是为序。

2013年10月6日

（王长江：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社会动员：政治过程与治理形态	6
第二章 社会动员的核心要素	25
第三章 社会动员的载体建设	46
第四章 新时期社会动员的原则	63
第五章 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下的社会动员	78
第六章 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社会动员实践	95
第七章 农村社会动员的独特视域	117
第八章 社会动员主客体的关系调整	135
第九章 社会变迁与党的动员形态演进	158
第十章 在动员中实现党对社会价值的引导	184

第十一章 基层党建创新与社会动员演进	198
第十二章 社会逆动员：必须正视的社会运动形态	219
第十三章 构建社会动员新常态	241
参考文献	259
后 记	270

绪 言

在中国的语境里，动员是与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具体实践高度关联的一个概念。动员变迁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是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的一个观察维度。

中国近百年的沧桑巨变中，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广泛的群众参与，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也是中国克服物质匮乏和制度不完善的不足，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条件。社会动员在本质上就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过程，是动员主体将其价值和主张用有效的方式灌输给群众进而引导社会有效参与的过程。因此，社会动员的形态与动员主体和客体自身的价值属性、利益倾向相关，并受人们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型时代。转型带来的价值变迁和结构调整，直接体现为社会财富积累的失衡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困境，多发频发群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动员模式，也使得简单说教式的动员变得低效。如何从中国生动丰富的发展实践中、从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吸纳社会动员的有效给养，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解释力、说服力的动员理论、动员方法，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也就是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本质上是与党的建设的现代化实践相联系的，它需要实现与社会发展文化大环境的良性互动。在党与社会的良序互动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是现代政治中社会动员最重要的内容。

在阿尔蒙德看来，政治体系如果不能很快地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得多的政治抱负和高涨的社会期望，行动就会陷入困境。在中国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阶段，党需要推进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稳定，而经济的崩溃和社会利益的耗蚀必然导致政党合法性的丧失。依法治国的理念变成依法治国的制度实践不可能一蹴而就，党在执政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执法来葆有社会发展的确定性，另一方面还需要迅速整合不同社会诉求形成权威配置资源的理论依据和价值标准。当分化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都把利益最大化的期望寄托在党和政府身上时，党的社会动员过程，就是要为分化的社会主体寻求一致的价值与利益期待，并努力为党领导国家公平配置资源提供舆论导向。尤其是当社会不断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与党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之间的矛盾逐步凸显的时候，如何引导社会并达成行动一致，对党的动员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①

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们主体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改变了社会动员的传统路径，也使得社会动员拥有了现代转型的各种条件。本书试图从历史与现实交互的维度，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动员实践出发，从中国古代社会动员的文化土壤中，寻求今日中国社会动员的具体形态。本书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动员的运行机理和变迁实践，意在通过对动员理念的演进、动员形式的变迁和动员效果的把握，探讨中国国家

① 在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之前的任何时候，政党或政府都不可能使所有社会成员的要求都得到满足。这种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可能导致政绩评价和社会心理的失衡，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甚至可能伴随党内腐败问题的凸显而使得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

与社会现代化的实践逻辑，进而阐释政党与社会互动的内在机理，以及由此而生的组织生态和制度体系建设，从而发育出社会治理中政府、市场、社会角色清晰，责权明确的互动模式；提供我们解读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脉络。基于论证的需要，本书直接从中国社会变革的伟大历史背景出发，从国家建设与社会成长的现实需要来阐述社会动员的演进逻辑。本书内容包含以下三部分：

1. 从理论上阐述社会动员的运行机制及其转型要求，并试图通过描述这一变迁的动员模式，解读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实践和中国社会成长的内在逻辑；阐述社会动员和党领导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出党的社会功能发挥与社会成长的实践形态，以期展示党的理念转型、制度完善、组织结构调整和功能重构的内在理路，从而更好地保障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实现党的主张与群众根本利益的契合。

2. 综合分析社会动员的基本要素和实践条件。一是从历史维度梳理社会深刻变化对社会动员主客体及动员内容构成的具体挑战。二是探讨社会动员得以展开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基本原则等相关要素。强调社会动员实践是与党和政府改善民生，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联系的。因此，党的社会动员能力是其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三是通过社会动员具体的变迁实践，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动员的独特视域，探讨党和政府的主张如何变成社会共识并形成有效的社会参与。在此基础上阐述社会动员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动员得以展开的环境要素，以及信息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动员的基本原则等基础问题。

3. 通过对社会动员变迁实践影响要素的分析，廓清传统文化和时代特征交互背景下的动员有效性问题，探讨社会动员目标建构如何契合人们共有的习惯，并在实现利益中获得持续动员的基本动力。一是分化社会的动员实践，就是要通过组织基层以葆有良序，通过思想引导以达成创新与发展共识。这其中，动员的基础是承认价值多元和主体差异。二是动员实践需要建成社会价值框架，完善组织运行的制度

体系，激活党建存量和社会资本，形成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保障能力，降低人民民主发育中的非制度性参与。三是强化党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领导，构建社会动员新常态。

就实践本身而言，社会动员是为了更好蓄积资源，使动能和势能往动员主体的目标趋赴。动员的这一基础特征表明，动员式治理的恰当性就在于治理过程首先是基于物质支撑的有效性来展开，而公共资源的有限性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稀缺性，决定了动员过程需要集中资源以实现把钱花在刀刃上的现实需要。由此有了关于社会动员的第二个要求，即动员过程是在分化社会寻求一致的过程，是通过凝聚共识来达成社会参与的行动一致。治理框架下社会主体分化趋势日益加速的时候，政党动员过程如何获得分化社会普遍一致的参与，这体现着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社会动员的第三个要求就是共识形成中的价值一致性或者说普适性。这一点无论我们如何解读，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所以，我们谈论的动员，在其本质意义上乃是一种价值重构的过程，或者价值重新解读的过程。人们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推动着价值规范的形成，并在遵守这些赋予了正义精神的规范中，实现了自身的利益并拥有了满足感和精神的愉悦。由此，动员过程显然就有了对动员主体的正义期待和公平要求，有了对动员过程的规则需应。人们只有获得了价值和利益预期，才能真正获得参与治理并信守行为边界的动力。

社会动员过程中，社会动员的主体辨识极为重要。我们知道，传统动员理念是建立在政治结构中居于强势地位的主体展开的，传统的管理框架建构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信息传输的单一通道，并形成与此相应的压力型信息传输模式。这意味着既有秩序中的动员逻辑是以管理者的认知和价值观作为起点的。而任何试图冲击和改变既有秩序的动员过程，都可能被视为逆向动员而受到约束和控制。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党的社会动员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制度